

钱理群著

周作人论

● 人文研究丛书 ●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编 ● 上海出版

周作人论

钱理群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范一辛

•人文研究丛书•

周 作 人 论

钱理群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11,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001—5,000

ISBN 7-208-00502-8/C·19

定价 8.00 元

目 录

第一编 “周作人道路”及其意义

- 一、20 世纪中国大变革中的历史 抉择 1
 - 周作人、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比较
- 二、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道路 36
 - 周作人、鲁迅文学观的比较
- 三、动荡时代人生路的追寻与困惑 61
 - 周作人、鲁迅人生哲学的比较
- 四、两大文化撞击中的选择与归宿 78
 - 周作人与东、西方文化关系的考察
- 五、走向深渊之路 90
 - 周作人后期思想研究

第二编 开拓者的足迹

- 六、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识结构 109

目 录

七、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	119
八、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147
九、民俗学研究与国民性的考察·····	166
十、周作人的散文艺术·····	196
十一、周作人的文艺批评·····	213
十二、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实践·····	225
十三、周作人与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	239
十四、周作人对现代小说、散文理论的历史贡献·····	255
十五、周作人与五四诗歌艺术思维的变迁·····	265

第三编 周作人与同时代人

十六、周作人与章太炎·····	275
——“谢本师”及其他	
十七、周作人与蔡元培·····	285
——“兼容并包主义”及其他	
十八、周作人与李大钊·····	295
——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及其他	
十九、周作人与陈独秀·····	306
——“宗教问题”论争及其他	
二十、周作人与胡适·····	322
——两位自由主义学者之间	
二十一、周作人与钱玄同、刘半农·····	335
——“复古”、“欧化”及其他	
二十二、周作人与文研会、创造社同人·····	351
——“自然主义”、“浪漫派”及其他	
二十三、周作人与现代评论派、新月派诸君子·····	373
——“绅士”、“流氓”及其他	

二十四、周作人与湖畔诗人·····	386
——良师益友及其他	
二十五、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	392
——师生之间	
 附 录：当代部分青年眼里的周作人·····	406
 后 记·····	425

第 一 编

“周作人道路”及其意义

一、20世纪中国大变革中的历史抉择

——周作人、鲁迅思想发展道路的比较

(一)

20世纪是以“亚洲的觉醒”与“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为其开端的。“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的中国的觉醒，无疑在“亚洲的觉醒”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崛起，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

东方巨人中国沉睡的时间是过于长久了。但谁会料到，这个几乎已经“老化”了的民族，竟然潜藏着那么巨大的生命活力。本世纪初，她刚刚从“中世纪的停滞状态”中“觉醒过来”^①，短短的几十年间，就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走了欧洲几个世纪的思想历程。这一往无前的民族进取精神在本世纪内一再使举世为之震动。但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传统思想的枷

① 以上引文均引自列宁：《亚洲的觉醒》。

锁比任何国家都更沉重。每前进一步，都要与历史的惰力进行搏斗。时代发展的道路竟是如此之艰难与曲折，也为举世所罕见。历史跨入20世纪之后，中华民族伟大觉醒的进程，始终交织着前进与倒退，突变与停滞，苦闷与追求，彷徨与抉择，充满了饱含血泪的痛苦，也有着最巨大的欢乐。在这历史的起伏中，造就了一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其最有典型意义的代表，就有鲁迅与周作人。

鲁迅的道路完整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发展方向及其全部丰富性与深刻性。他首先比较充分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精神的熏陶，与古老中国的封建传统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成为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后在十月革命新思潮影响下，他又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鲁迅的这一道路，给中国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华民族以巨大的影响，至今仍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周作人的道路，以悲喜剧的色彩表现了中华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全部复杂性和曲折性。他曾经背叛封建士大夫阶级，成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但他拒绝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渐渐远离时代的主流，漠视民族的奋起，反对人民的斗争，虽几经挣扎，仍不能冲破封建传统思想的罗网，并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

将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发展道路作一综合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本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和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并从中引出必要的历史教训，以为后人借鉴。

(二)

我们的分析从1907年鲁迅发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周作人发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开始，乃是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总的说来还是处于学习阶段——和当时多数“新派”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先是受严复、梁启超、林琴南的影响^①，接受了西方新思想、新文学的启蒙教育，以后又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转向章太炎^②，并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各种新思潮以及俄国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从1907年发表上述文章开始，鲁迅与周作人以独立姿态并肩出现于中国思想文化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早在上一世纪末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就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从“宇宙之中心”的幻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远远落后于西方。严重的民族危机感引起整个民族（通过自己的先进分子）进行严肃的反省：西方强盛、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什么？什么是根本的民族复兴之道？——正在关怀着民族命运的周氏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有两个现成的答案：或以为西方强盛在于“物质文明”，遂“竞言武事”，热衷于“制造商估”；或以为西方强盛在于“社会民主政治”，遂“以众治为文明”，而热心于“立宪国会之说”。鲁迅却力排众议，明确提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物质文明、民主政治等等，

① 周作人：《瓜豆集·关于鲁迅之二》。“在南京的时候，豫才就注意严几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遗事》以后，随出随买，……末了是梁任公所编刊的《新小说》、《清议报》、《新民丛报》，的确都读过，也很受影响……”。

② 参看本书《周作人与章太炎》一节有关部分。

“此特现象之末”。鲁迅由此得出结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①。鲁迅不同凡响地提出了一个以“立人”为中心的思想纲领，其内容包括争取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启发“国人之自觉”两个方面。前者是鲁迅与周作人共同关注的问题，又各有侧重；后者是鲁迅的思想出发点。

马克思说过，封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人”^②。他曾经强调指出，德国从中世纪得到解放的唯一实际可能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③。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中国，对于人的价值的贬抑，个性的压制，思想的束缚，远比欧洲历史上的封建国家为甚，这是中国基本国情之一。因此，人的价值的发现与强调，对于冲破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长期统治，唤起民族自觉，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在鲁迅之前，严复、章太炎等人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提倡过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和自由^④。但是，包括当时最激进的革命者在内，对于思想战线上“专制永长，昭苏非易”^⑤的严重性都估计不足，他们甚至把争取整个民族的独立

①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② 马克思：《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

③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④ 章太炎在《国家论》中，针对封建国家对个人的压抑，把“个人”强调到极端的地步，所谓“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皆然”，“村落，军旅，牧群，国家亦一切虚，惟人是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严复在《原强》里也把政治民主归结为“个人自由”：“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皆得自由始”。

⑤ 这里是借用鲁迅《〈越铎〉出世辞》（《集外集拾遗》）里的话。

自由与争取个人自由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吾侪求总体之自由者也,非求个人之自由者也”^①。因此,他们的实际注意力都集中于民族革命的具体政治目标,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呼喊淹没在反清排满的主旋律之中。现在,鲁迅如此明确地把人的个性解放、人的思想自由置于“立国”根本之道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鲁迅的独特贡献,表明他对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本质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的认识,对于中国国情的了解,都超过同时代人,最鲜明地表现出启蒙思想家的特色。

为争取人的个性解放,鲁迅考察了两种流行的人的价值观念。一种鲁迅称为“社会民主之倾向”,即把人首先看作是“社会之一分子”。因此,必然地将人的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把社会平等与民主的要求置于个性解放与自由之先。另一种鲁迅称为“极端之个人主义”的倾向,“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社会进步以个性发展为前提,因此主张“绝义务”、“惟发挥个性,为最高之道德”^②。鲁迅的立场包含着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作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他十分重视人的社会责任,他所提倡的个性是拜伦式的个性,其基本特征就是“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③,“凡有危邦,咸与扶掖”^④;但另一方面,他又力主个人解放为社会解放的前提,认为强调个性服从社会国家的要求,必然导致“灭人之自我,使之混然不敢自别异,泯于大群”^⑤。对于个人超越社会的“无上之价值”的强调,几乎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其思想发展

① 陈天华:《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

②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③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④⑤ 鲁迅:《坟·破恶声论》。

初期的共同特点^①。这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总是打着“国家”、“社会”的旗号来贬抑个人价值，强迫人的个性服从于共同的封建社会伦理原则（即孔孟之道）。因此，一旦人们从封建思想束缚下觉醒，就必然对所谓社会责任抱有本能的反感，将人的个人价值强调到极端，鲁迅说这是“物反于极”^②，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惩罚。这种惩罚在思想发展的初期，不仅带有历史的必然性，而且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它的锋芒所向，是戕害人性、否定个人价值的封建专制主义，从而成为知识分子以至整个民族觉醒的开端。

周作人在日本时期更关心的是“人性”的全面发展。他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深刻地探讨了物质与精神在人的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周作人肯定“人生之始，首在求生”，因此“衣服饮食居住之需，为生活必须”。但周作人更认为人毕竟不同于动物，他于“求生意志”之外，还要求“天赋之性灵”的自由发展。在周作人看来，所谓人的解放、人性的全部发展，包括物质的生存欲望的满足及精神的自由发展两个方面，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

周作人的这一思想同样具有消极、积极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从“人的精神自由发展”的要求出发，他对禁锢思想自由的封建帝王专制统治及儒学思想专制进行了极为猛烈的攻击。周作人将孔子儒学与封建专制统治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指出：在中国，孔子儒学已成为“字之帝王之教”，“盖孔子定经而后，遂束思

① 毛泽东在早年所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语中，就这样说：“个人有无上之价值，……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可也”。陈独秀也有个人是社会的基础、“满足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的主张。参看李锐：《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收《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之三》）。

②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想为一缚”，“天阅国民思想之春华，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他的结论是：“吾国……独亚于他国而希更始之机者，正以惟吾国有孔子故”。他大声疾呼，欲思想解放必“搢儒者于门外”。——这已经是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先声了。但另一方面，对主观精神力量的极度夸大，就出现了谬误。周作人鼓吹：“一书之力，恒足以左右人间。……斯妥夫人《汤姆之小舍》书出，致兴南北美之战，而黑奴终解”^①。因此他以及鲁迅都把伦理的改造、人性的改造（包括国民性的改造）置于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心位置，这就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中国好几代知识分子在开始探求中华民族自强之路时，都犯过这种“夸大主观精神力量”的历史错误。这里根本的原因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现实物质力量过于薄弱，以及在与人民结合之前知识分子所感到的自身力量的薄弱，都使得人们不能不到主观精神那里去寻找力量，有意无意地把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膨胀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②，因此，当鲁迅在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经济的实践中，找到了依靠力量，他就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脱离人民实践的周作人则始终未能摆脱历史唯心论的束缚。

当鲁迅、周作人这样的少数先进分子强烈地要求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却依然处于封建思想严密统治及小生产者狭隘意识的严重束缚之中。从少数先觉者的觉醒到整个民族的觉醒，需要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于是，一切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都要面临“如何对待不觉悟的人民群众”这个严峻的问题。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回答是：正因为人民不觉悟，因此，“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③。以孙中山为首

① 周作人：《读书杂拾（二）》。

② 列宁：《谈谈辩证法》。

③ 梁启超：《中国人之缺点》，收《辛亥革命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

的革命派一方面主张给人民以权利，另一方面却又认为由于人民不觉悟，必须由“先知先觉”者掌握“治权”，对人民加以训练，然后才能由“训政”转而施行“宪政”。鲁迅固然也为人民的不觉悟感到愤激，但是，他却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民的作用。他强调：“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①，认为先觉者的全部历史作用就在于“发国人之内曜”，使“素为吾志士所鄙夷不屑道者”，“咸入自觉之境”^②。运用文化的武器，改造国民性，促进民族的觉醒，这就是鲁迅在本世纪初所选择的救国之途。可以说，战斗伊始，鲁迅的生命就与“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业结合在一起了。

就这样，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时期形成了以“立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他们的思想保持着总体的一致性，而其思想中包含的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矛盾因素，以及不同的着重点，和他们对革命实践的不同态度，都决定着他们今后不同的发展道路。

（三）

尽管早在本世纪初，鲁迅与周作人就已经显示出思想的独创性与深刻性，但是，历史条件的不成熟，迫使他们不得不沉默了将近十个年头。直到标志着中华民族觉醒新阶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给他们及其同时代人提供了一个创造历史的机会。

在同样的历史机会面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历史作用，取决于对历史提出的任务的认识深度。1918年底，1919年初，鲁迅与周作人先后在《渡河与引路》和《思想革命》两篇文章中，

①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

②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破恶声论》。

明确提出中国所需要的“文学革命”应该包括“文字改革”与“思想改革”两个部分，“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①。他们警告说，“我们不可对文字一方面过于乐观，闲却了（思想）这一方面的重大问题”^②，“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③。鲁迅与周作人说这番话时充满了历史的责任感。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太多的“换牌不换货”的悲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始终没有进行过比较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鲁迅与周作人同时自觉地意识到并且提出了这个关系着中国革命前途的历史课题，从而抓住了在促进民族觉醒的斗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这就奠定了他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至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反封建的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因此，鲁迅与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毫无疑问是并肩战斗的。他们不仅面临着共同的历史任务，而且有着日本时期已经奠定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人”的价值的高度重视。因而他们也有着共同的战斗领域：一致地向着封建禁欲主义宣战，勇敢地宣布“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的欲求，无不完善洁净”^④，“觉醒的人应该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的创造者的意义”^⑤。他们共同为争取妇女与儿童的“人”的地位大声呐喊，猛烈攻击封建贞操观、节烈观，提倡“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牺牲的“幼者本位道德”^⑥。他们同时强调人的个性解放，主张“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个人做

①② 周作人：《谈虎集·思想革命》。

③ 鲁迅：《集外集·渡河与引路》。

④ 周作人：《谈龙集·爱的成年》。

⑤ 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⑥ 周作人：《谈虎集·祖先崇拜》；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